

1905—1945年东北大田作物种植格局变迁研究

朱星宇 包平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东北地区主要作物的种植,晚清以前维持以“大豆—高粱—粟”为主的格局,晚清以降,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东北地区形成了以大豆为中心的种植格局。为满足人口的口粮需求,东北的大田作物生产出现了地理上的差异景象。“伪满”政权建立后,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日本殖民政治干扰等因素,动摇了以大豆为主的种植格局,导致了农业生产滑落于衰退的边缘。1937年后,抗战全面爆发,粮食供应日益紧张,日本为弥补短缺的“战争物资”,全面加强了对农业领域的殖民控制,因此,作为东北农业主流的大田种植不仅结构上被重塑,而且部分农产品还在数量上出现了“另类”的畸形增长。

【关键字】近代;东北地区;大田作物;种植格局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4-0081-14

Plant Pattern Change of "Main crop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05 to 1945

ZHU Xing-Yu Bao P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Befor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main crops in Northeast China maintained the pattern of "soybean sorghum millet". However,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invasion of foreign capitalism, in order to meet the food needs of the population, the field crop production in northeast China has appeared the scene of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regime,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interference of Japanese Colonial politics and other factors have shaken the soybean based planting pattern, and even led to the declin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ll-out war in 1937, the supply of food became increasingly tense. Meanwhile, Japan strengthened its colonial control over the agricultural field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war materials". Therefore, the field planting, as the mainstream of agriculture in Northeast China, was not only re-shaped in structure, but also had an abnormal growth in quantity.

Key words: modern; the northeast region in China; main crops; plant pattern

绪论

由于当代东北农业具有相当突出的重要性,学术界时有对于近代以来东北农业种植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对于近代东北作物种植问题的研究采用以农业作物“种植景象”的描述方式,如李令

[投稿日期]2020-12-13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方志物产知识库构建及深度利用研究”(18ZDA327)

[作者简介]朱星宇(1989-),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包平(1964-),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农业史。

福在上世纪末用专文描绘了清末民初东北作物的种植景象^①；而于春英、张立彬等人也以专文从“商品经济所导致的生产专业化”的角度讨论清末民初的东北作物种植的集中现象^②；程叶青等人也讨论了近代东北的商品粮生产格局在形成的过程中农业政策、技术发展、人口增长与城镇交通网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③。中兼和津次则从农业产出、投入与生产率三个方面分析了近代东北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情况与原因^④。

事实上，无论采用何种种植模式，作物的种植效益问题永远是农业种植无法避开的话题。上世纪末叶，“作物变迁”的研究者开始尝试借助经典农业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建构起社会经济变化与作物种植结构的相关模型，用以具体解释区域性的农业种植结构变迁现象。以美洲作物为例，王思明就总结了人口增长与商品经济发展等要素是促使美洲作物在中国快速传播的根本原因^⑤；曹玲等人在考察美洲作物在华传播的过程中，发现了美洲作物与本土已存的大宗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存在负相关性，也因此较早地提出了“作物竞争”的概念^⑥；王政军、王宝卿等人在关注近代玉米、番薯在青岛地区传播并形成集中产区的过程中，认为人地矛盾与作物的比较优势属性是其中的关键^⑦；郭声波与张明在思考历史上的花生区域特点时，则认为气候与土宜等组成的自然条件是近现代中国花生种植形成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⑧；曹树基也着重描述了作物的种植比例与地区的重要性，并以方志中的“出产大宗”或“食粮大宗”作为区分某种作物形成集中产区的重要标志，这种对文献量化的比较手段，告诉我们作物比例于区域农业的重要性^⑨。在此基础上，王保宁在讨论清代以来山东东部玉米种植情况时论述了耕作制度的更新融入与玉米种植的关系^⑩。这些全新的研究范式，说明了作物种植的效益问题，是考量历史上的农业种植现象时必须解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所试图探究的是近代以来东北地方大田作物种植变迁的历史过程，其中不仅仅包含作物之间自然属性的竞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外部环境的变迁所导致的作物种植效益的变化。所以，在传统时代农民种植仍以经济效益为考量的基本前提下^⑪，以更为精准的数理统计重新考察和厘定大田作物种植格局（包括数量、比例与需求等诸多种植内容）与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显然是重要和必要的，同时亦是另一个侧面深化对传统农业问题的讨论。

一、1905—1931 年间东北大田作物种植效益与格局

直至晚清，东北地区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产区。原因有二：第一，在 20 世纪前，欧美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以亚麻、棉籽与橄榄等作物作为主要的植物油来源^⑫，由于气候、土宜以及文化与饮食习惯

① 李令福：《清代东北粮食作物的地域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 年第 4 期。

② 于春英、张立彬：《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与布局的变迁》，《历史教学》2010 年第 4 期。

③ 程叶青、房艳刚：《东北地区农业地域结构形态的历史演变》，《经济地理》2010 年第 8 期。

④ [日]中兼和津次：《旧满洲各地区农业生产结构》，《一桥论丛》1982 年第 87 卷。

⑤ 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三峡出版社，2010 年。

⑥ 曹玲：《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3 年。

⑦ 王政军、王宝卿：《清末至民国时期玉米、番薯在青岛地区的传播及对居民主食结构的影响》，《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⑧ 郭声波、张明：《历史上中国花生种植的区域特点与商业流通》，《中国农史》2011 年第 1 期。

⑨ 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1990 年第 2 期。

⑩ 王保宁、曹树基：《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兼论新进作物与原作物的竞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 年第 4 期。

⑪ 关于中国农民的种植决策问题，可参见刘帅：《市场交易条件与农户种植行为决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年，第 29 页。

⑫ 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大豆》，《满铁调查报告》第 4 辑 第 1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12、218 页。

等因素,欧美国家对于改换种植大豆兴趣不大;第二,虽然东北的耕作技术仍相对落后,但由于东北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东北的大豆种植具有世界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以商品贸易中最为主要的价格而言,在整个1920年代,已经开始尝试规模种植的美国大豆与东北大豆相比,美国的大豆单位价格高出三分之一以上^①。尽管如此,由于世界大豆贸易市场需求不大^②,东北大豆的种植仍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种植规模未见显著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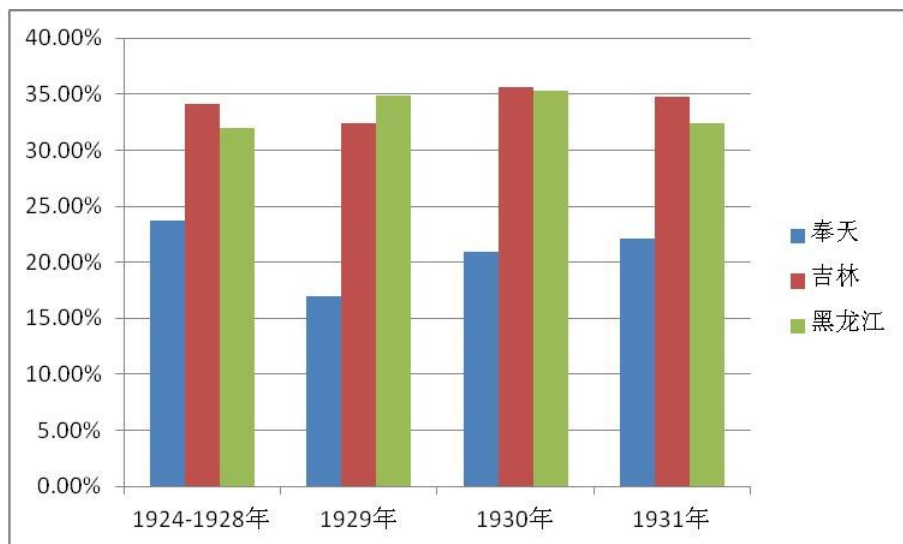


图1 1924—1931年东北三省大豆种植比例

注:此图依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满铁总务部调查课的1929—1931年《满洲产业统计》与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的《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业生产篇》的农业种植数据汇制。

不过,在进入20世纪后,东北大豆的出口贸易开始显现诸多的利好因素。其一,近代交通网络,尤其是铁路网络的便利,为东北大豆的出口带来了便利。从1896年《中俄密约》协定东北第一条铁路的中东铁路开建,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中日俄三方在东北累计修筑铁路里程达6507公里^③,打通了东北地区各个走向的交通。对此,日人就曾高度评价近代东北铁路网对于大豆出口的巨大作用,“以满铁中东两大铁路为中心之交通网,能使多量大豆之集合输送异常便利”^④。其次,由于炸药、肥皂等化工工业的出现与繁盛,欧洲油脂工业迅猛发展,对于油料的需求量激增,而当时欧美传统的油料作物产量逐渐无法满足相应的油料需求^⑤,而原产于中国的大豆,因为种植规模的庞大及出油率高等特点,正可以弥补这其中的需求缺口。仅以豆油一项为例,从1912年至1928年,东北向欧美地区出口的成品豆油从9万担猛增至92.5万担^⑥;最后,日本与苏联为了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以满足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需

① 参见尹广明:《20世纪初东北大豆出口繁盛原因探析(1900—1929)》,《兰州学刊》2014年第12期。

② 根据[日]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书中所述,东北地区自清中期以来就有与江南地区的大豆贸易。依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6—187页的1870—1890年的大豆出口数据,其最大出口额不过578千担,最小时仅5千担,数额并不大。

③ 参见尹广明:《20世纪初东北大豆出口繁盛原因探析(1900—1929)》,《兰州学刊》2014年第12期中的东北铁路数据。

④ 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大豆》,《满铁调查报告》第4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⑤ 关于1905年后的欧洲油料不足的情形可参见迟青峰:《国际需求与东北油坊业发展研究》,《农业考古》2018年第3期;尹广明:《东北大豆出口贸易衰落原因探析(1929—1945)》,《农业考古》2015年第3期。

⑥ 豆油出口数据参见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189页。另外根据尹广明在《东北大豆出口贸易衰落原因探析(1929—1945)》一文中的发现,由于东北地区油坊业的落后,大豆出油率相对低下,欧美国家更多时候采取了直接购买大豆自主加工,因此实际豆油需求应该超过此数。

求^①,对于肥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而此时的化肥尚未普及,天然肥料如堆肥等在其中又占有主导地位,寻求广泛的肥料来源因此变得急迫。作为大豆副产物的豆粕因含有大量的氮素对于土地肥力提升的效果明显,深受日苏两国农民的喜爱^②。因此,在外界对于东北大豆的需求不断扩大的大背景下,扩大大豆种植是农民必然的选择。对此,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亦多有专门描述彼时大豆种植扩大的盛景。民国6年的沈阳县志载道:“(大豆)本属农产大宗,占输出口巨额”^③;伪满康德元年(1934)的《吉林新志》亦记载:“岁收占耕地三分之一,实为本省之特产出口”^④。

进入20世纪后,尽管东北大豆的商业贸易优势非常明显,但东北各地区的农民对于大豆种植却反应不一。结合图1的种植比例的数据分析可知,靠近安东、营口与大连三个重要港口地区的奉天地区对于大豆的种植虽然保持了相当高的热度,却远不及交通地理上更为远离三港的吉黑两省。对此,于春英、张立彬将之归结于“商品经济所导致的生产专业化”^⑤。这种结论能否完全解释大豆种植的重心北移现象仍待进一步地考证。要证实这一结论需要明确的地方在于,奉天省的农民是否存在经济价值上可与大豆相媲美的经济作物。仅从奉天省农民的种植结构来看,烟草、棉花等典型的经济作物占有一定的比例,却非农民主要种植的种类^⑥。即便是作为主要种植的粟、高粱与玉米,在商业贸易中的需求数量与大豆比并无优势,且极不稳定(见表1)。由此可以推定的是,奉天省大豆种植的比较劣势与可替代的经济作物并无关联。

表1 1925—1929年南满三港主要农产物外贸状况^⑦

出口 作物	1925年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数量	单位 价值	数量	单位 价值	数量	单位 价值	数量	单位 价值	数量	单位 价值
玉米	2349851	2.22	3162959	2.98	1647078	2.7	1284716	2.78	1477899	2.63
高粱	7872081	2.11	4913861	2.43	7177188	2.38	7620201	2.45	3158352	2.42
粟	4254777	4.55	5296656	4.45	6059315	4.94	4751763	4.47	3607118	4.38
小麦	12600	3.53	2793	4.39	253950	4.09	955081	3.92	550786	3.72
棉花	622	31.47	274	27.66	145	29.06	158	26.87	995	30.99
大豆	14924404	3.63	12886668	3.67	17026722	3.73	24669068	4.06	36923816	3.81

资料来源:此表依据满铁总务调查课:《(昭和5年)满洲产业统计》,海文堂书店,1931年,第60-61页的数据绘制。

而从另一角度则可发现,奉天大豆的种植比例虽较少,而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却高于吉林与黑龙江地区^⑧。有学者曾发现“近代东北市场权力的殖民化与粗粮的主食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⑨。而粗粮主

① 根据张宗华:《苏联时期俄国城市化的特征及历史渊源》,《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盛朗:《苏联的城市化》,《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5期以及陈志光:《中、日、韩城市化特征与比较》,《东北亚学刊》2016年第5期中的数据,在总人口增加的基础上,苏联与日本的城市化率从1890年的10%上升至1930年的近30%。

② 豆饼出口数据参见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0页。从1912年至1928年,日苏两国进口东北豆饼占东北豆饼全部出口量的90%以上。

③ 民国《沈阳县志》卷12《物产志》,民国七年铅印本,第200页。

④ 民国《吉林新志》上编第五章《物产》,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第99页。

⑤ 于春英、张立彬:《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与布局的变迁》,《历史教学》2010年第4期。

⑥ 根据《(昭和4年)满洲产业统计》的数据,奉天省的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都在1%以下。

⑦ 其中表格数量单位为担,单位价值为海关两。

⑧ 根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满铁总务部调查课的1929—1931年《满洲产业统计》的数据,从1924—1931年,奉天省粮食种植面积占年均总面积的75%以上,而吉林与黑龙江省的粮食种植面积占年均都在60%~70%之间。

⑨ 王大任:《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食化的观点亦得到了近代东北地方史料的验证：“奉省通常食品，大抵辽，沈，洮，昌各县，地多平原，农产以高粱、谷子、黄豆、黍、稻为大宗，居民日食以此为常……东边各县多山，农产以玉蜀黍为多，居民常食以此为主，通曰包米。或煮食，或磨面为干粮。间食小米，秫米食者较少矣”^①；“（吉林省）民食以小米子（谷米）为主，而高粱米（秫米），苞米荳子（玉蜀黍米）为副。至粳米（旱稻子米），白面（麦粉），大米（水稻米，近十年始多），例为上层社会之常食及一般民众遇有待客及年节或婚丧大事时之贵重食品”^②；“（黑龙江呼兰）以小米为主，以秫米，包米，黄米及包米面（城居者多食之），黄米面（乡人多食之）为辅，以粳米，面粉为上，间一食之”^③。另外，以高粱与粟为代表的粗粮给农民带来的附加经济效益亦不可忽视。在传统时期农民的基本生活结构中，以“谷草”为代表的秸秆对于农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高粱秸可以“织席造纸，土人用以为薪”，而粟米谷草则“饭饲牲畜最佳”。在农民本能地依靠农地产出解决生活需求的大前提下，粗粮的选择性种植显然更有利于农民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而更大的经济因素在于，稻麦这样的细粮作物单位产量有限，在数量效益不及粗粮的同时，更为致命的是稻麦种植过分依赖于丰沛的水资源，并直接导致了限于落后的农业种植工艺而受到了环境的种种限制（见表2）。

表2 奉天省粮食作物种植效益一览^④

粮食作物名	种植用量	收获量	种植环境	谷草收获量
小豆	6升	3~4石	-	-
谷子	3~4升	6~7石	性畏水涝	草二千斤
玉米	1斗4升	2~5石	-	-
黍子	6~7升	6~7石	-	-
高粱	5升	4~10石	-	秫秸千余束
陆稻	2斗余	10石	畏旱喜涝，洼地最宜	-
小麦	2斗5升	3~4石	沿河一带及塘地多有种者	-
水稻	3升	1.2~1.3石	洼地辟水稻田	-

资料来源：王树楠、吴延燮、金毓黻的民国《奉天通志》卷113《实业志》，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点校本，第2544页。

那么，要解释奉天省的主粮种植重要性高于北部吉黑两省的表征，就需要重新审视奉天省的主粮与人口格局的相互关系。在基本可以忽略稻麦这类细粮所占有的农民主食成分的同时，粟、高粱与玉米粗粮三品的产量至关重要。对此，不妨将近代奉天省人口与食粮需求置于一起讨论。

表3 近代奉天省人口与主粮需求关系表（单位：石）

	1908年	1929年	1932年
人口	10155680	14988560	13500000
主粮产量	16029267	27338846	25764837
粮食需求理论量	18534116	27354122	24637500

资料来源：表格中1908年的人口数据来自于满铁资料《南满洲农业概要》，1928年与1932年的人口与产量数据分别来自于《满洲产业统计》。1908年的产量数据来源于1928年的高粱、粟与玉米的单位产量乘以相应作物的1908年的面积数据而得的估算值；而粮食需求的单位理论值源于《南满洲农业概要》所载“成人一日（三食）平均约需五合”乘以对应年份的人口数据所得。

① 民国《奉天通志》卷99《礼俗》，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点校本，第2282页。

② 民国《吉林新志》下编 第三章《人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第222-223页。

③ 丁世良等：《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东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11页。

④ 东北近代重量单位亦是以石、斗为标志的计量单位，但其重量与标准的石并不相同，约为民国标准石的2.5倍，辽斗仅为东北重量单位石、斗的传统称呼。种植与收获单位面积以1垧也就是10亩为基本单位，而重量单位以中国东北石（即辽斗）为基本单位。具体可参见裴焕星：《辽阳县志》。

由表3可知,纵然种植比例处于起伏不定的状况,主粮产量却始终与人口保持着高度的协调性。也就是说,对于主粮种植,奉天省的农民不仅是选择粗粮以作口粮,而实质上是在依照自己最低生存需求的前提下选择种植。而大豆、小麦与水稻的产出相当部分都因为农民采取售卖的方式换取了货币^①。不仅是奉天省,铁岭以北的吉林与黑龙江两省,人口的最低粮食消费量与主要粮食的产量同样呈现出了正相关性(见表4)。而奉张时期铁岭以北地区的人口的相对稀少,粮食负担相对较轻,是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农民相对于奉天省增加大豆种植的最为直接的原因。

表4 吉林、黑龙江两省人口、粮食产量与理论需求值

省份	主粮产量(石)		人口		粮食需求理论值(石)	
	1929年	1930年	1929年	1930年	1929年	1930年
吉林	20075531	19301553	9075630	9191980	16563025	16775364
黑龙江	12264385	11052524	5133730	5231370	9369057	9547250

注:此表格中的人口数据与主粮产量来自于《(昭和4年)满洲产业统计》与《(昭和5年)满洲产业统计》,其中粮食产量单位原文以吨或日本石计算,日本石与中国东北石约以1:1.3的比例换算,笔者以中国东北石为基本单位。

二、1931—1937年殖民统治下的种植格局重塑

1930年代伊始,东北的农业发展面临着重要的转折点。首先,1929年自华尔街爆发的股市危机迅速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及以此引发的各国贸易战等因素,导致欧美各国的实业大受打击,油脂工业亦无可避免。由此,给东北农业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大豆外贸的市场需求随即萎缩,而大豆对外出口的数额也随之出现下降。对于东北大豆贸易数量的下降幅度,不同的数据资料存在着一定的记载差异。日方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30—1931年间,东北大豆贸易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恢复期;而中方的数据资料则显示1929年直至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大豆贸易呈现出的是一种断崖式的下跌^②。尽管存在着差异,但无论如何,最迟至1932年,东北大豆的贸易市场事实上已经大为缩减。而伴随着大豆市场的萎缩,于是对东北过往的农业种植格局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一方面,大豆国际市场容量整体在缩小,这给农夫的大豆种植热情浇了一盆冷水,大豆尽管作为重要的农业作物,但大宗用处仅仅在于制作农民食用副产品的豆酱与豆腐以及豆饼粪田饲畜等,而粟和高粱这样的生活作物不仅可用于基本的食粮,也可满足农民在“饲畜”与“燃料”方面的生活需求。因此在东北大众的传统生活格局中,大豆占有的比例可以说是极其微小的,大豆的种植更多是为了农民换取必要的货币所需。可以推知的是,大豆种植在整个东北农业种植中的比重必然会随着大豆市场的萎缩而降低,从满铁调查的数据看,自1932年始东北大豆种植面积占比确实呈现下滑的趋势(见图2)。另一方面,与大豆种植重要性迅速降低并行的是,传统“主粮作物”的种植热情却有所提升,“而最近包米,谷子栽培面积急速增长”^③。

① 民国时期的东北方志大多有“大豆为本属农产大宗(占输出巨款)”的记载,而小麦在黑龙江与吉林等北部地区中也有“实为粮运出口之大宗”的记载,金颖则在《中国东北地区水利开发史研究(1840—1945)》中也有近代东北“大多数中国农民不会卖掉自己生产的粟、高粱等而购买高价的大米消费”这一结论。而这些也与粗粮的主食化观点相匹配。

② 相应的中方数据来源于许道夫的《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而日方数据来自于日本满铁所1929—1932年出版的调查报告,包括《满洲产业统计》、《满洲国外贸易统计年报(1932)》、《(昭和11年)满洲产业事情》。

③ 满铁经济调查会:《一般经济调查报告(龙镇县,奇克县,乌云县,逊河县)》,《满铁调查报告》第5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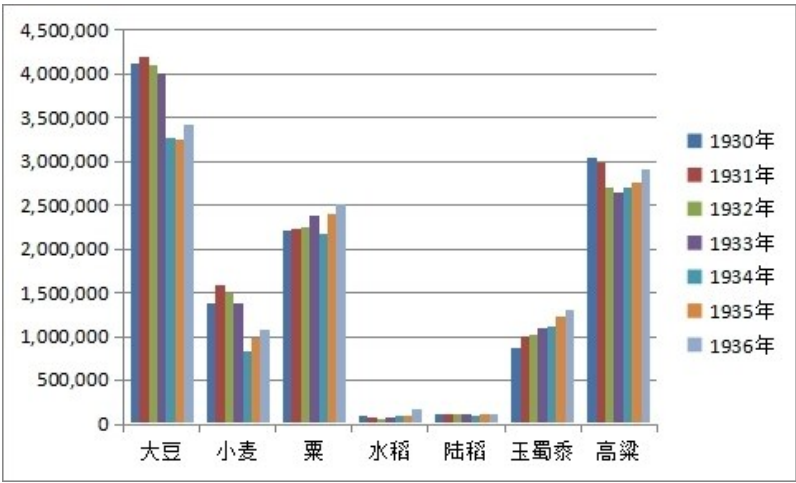


图2 1930—1936年东北主要作物种植面积（单位：公顷）

数据来源：《满洲产业事情（昭和11年度）》、《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产生产篇》与《满洲农作物收获量预想调查（康德3年度第3回）》。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东北全境在极短的时间内沦于日军之手，东北自此进入日据时期。而东北地方的传统产业——农业，尤其是作为大田作物的高粱、大豆等却在依循经济大萧条时的种植模式。作为农民主要经济收入的作物大豆，其种植面积在持续性地缩减；与此相对的是，作为粮食作物的粟与玉米，无论在种植比例或是面积上都呈现增长的态势。而更为严重的是，东北农业整体上已经呈现下行趋势。最具代表性的证据是在东北农业作为大宗的粮食作物与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数据相比，下行态势明显（见表5）。

表5	1930—1936年东北主要作物种植面积 ^①			（单位：公顷）
年份	种植面积(单位:公顷)	产量(单位:吨)	单位产量(单位:吨)	
1930年	13589920	18700550	1.38	
1931年	14056960	18452870	1.31	
1932年	13640460	15359340	1.13	
1933年	13241240	16846690	1.27	
1934年	11945970	12652208	1.06	
1935年	12477892	15567168	1.25	
1936年	12821275	17330861	1.35	

数据来源：《满洲产业事情（昭和11年度）》与《满洲农作物收获量预想调查（康德3年度第3回）》。

因此，可以用“衰退”一词形容伪满前期的东北农业种植状况。针对这一点，国内学界普遍认为1929年自美国蔓延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与日本在东北地方的残暴统治和野蛮的资源掠夺行为为其主要原因^②。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在东北的政治统治不可谓不血腥，与此同时，大萧条确实对东北传统的农业经济造成了重创，需要做出深度解释的地方在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与日本殖民者如何主观或客观地破坏东北农业发展，使之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

首先，这种破坏体现在农产品市场的整体萎缩。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后，作为东北地方出口的龙头产品的大豆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虽然有部分的农产品有一定的上升势头，但在数量上无法与大

① 原文单位为日本面积单位，陌等于10006平方米，约为1公顷。

② 针对于此，于春英的《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生产变迁的研究》、权哲男的《伪满洲国农业经济分析》、王大任的《经济史视阈下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等著述中皆有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详述。

豆相比(见表6),而同时根据权哲男的研究,日本对于大豆贸易的恢复措施实际上既有限,而且效果不佳^①。缺失了最大宗的经济作物大豆,农民的经济收入势必减少,这直接影响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热情。

表6 1931—1937年东北主要农作物出口数据 (单位:吨)

年份	大豆	高粱	粟	玉蜀黍
1930	2027302	143399	255217	66615
1931	2834930	301788	180311	59874
1932	2562999	373966	231262	70298
1933	2359000	155000	170000	71000
1934	2497000	202000	242000	124000
1935	1766251	71746	105374	33258
1936	1968006	186033	160927	118797
1937	1974235	126910	127366	111911

资料来源:数据表依据《满洲产业统计(1931—1932)》、1933—1934年度《满洲国外贸易统计年报》与《满洲农业要览(1939)》的贸易数据制。

其次,日军对于东北境内抗日武装的多方位残酷清剿政策,直接导致了东北地区,尤其是交战地区的经济严重受损。以高粱的种植为例,针对中国抗日武装频频袭击铁路的现状,日本就严厉禁止铁路两侧一定范围内的高粱种植^②,这就导致了高粱种植的下降。

而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东北实行的厚此薄彼的实业政策,加剧了东北农民在土地经营方面效益出现下降的趋势。对此,不妨全面审视1931—1937年的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政策。其一,在农业领域,农业生产并非伪满初期日本所关注的重点。1936年伪满在日本的授意下发布“产业五年计划”,在总投资金额达60.6亿元的情况下,农畜产部门仅分配发展金额为1.6亿元,同时在“产业五年计划”中农业发展任务为“主要粮谷年产量2000万吨(其中大豆600万吨,小麦100万吨),棉花50万担,甜菜40万担,还有烟、麻、柞蚕等”^③。从发展计划上看,尽管日本宣称对于东北农业一视同仁给予重视,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与日本发展有关的农作物被有意识地重点安排扩大种植与技术改良。举例而言,其中之一便是作为日本人主粮的水稻生产量的增加。J.C.Jones认为日本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供应在东北的日朝籍居民和预备多余的数量输往日本,同时还可以就近可供驻扎在东北和华北的日本军队”^④。

表7 伪满时期水稻种植数据

年份	种植面积(单位:公顷)	收获量(单位:吨)	单位产量(单位:吨)
1930	98140	154350	1.6
1931	81880	151640	1.9
1932	66120	109810	1.7
1933	79360	166010	2.09
1934	101780	213333	2.1
1935	101780	261490	2.57
1936	173951	437960	2.52

资料来源:数据表根据《(昭和5年(1930))满洲产业统计》、昭和11年版《满洲产业事情》以及《满洲农作物收获量予想调查(康德3年度第3回)》数据而推算。

① 参见权哲男:《伪满洲国农业经济分析》,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8页、183—185页的论述。

② [英]J.C.Jones:《1931年以后的中国东北》,胡继瑗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70页。

③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第203页。

④ [英]J.C.Jones:《1931年以后的中国东北》,胡继瑗译,第175页。

由表7可知,在1931至1936年间,东北稻米的发展可以说是持续性的,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种植面积与生产量的增加,且单位产量亦有较大的提升。而在与日本发展不甚相关的作物种植领域,日本仅作“增产”“提高”的字眼,采取的增产措施事实上极为有限,更有甚者,日本为了尽可能掠夺东北的农业资源,有意将作为东北各类作物的产销纳入殖民国家的体系之中,以官方手段加强对于粮食贸易的控制,例如在乡村城市中设置各类官方的粮食交易市场以图替代传统的粮栈。这种取代粮栈的中间商功能的行为,加之东北持续动荡的政治局势,使得粮栈的投资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这就打击了农村地主投资粮栈的热情。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粮栈经营之萎缩已经大致可见(见表8)。

表8 伪康德2年与4年东北粮栈比较调查

时间	粮栈数	资本
1935年	2037	38286207
1937年	1591	39857138

资料来源:此表据伪康德4年的《满洲油房及粮栈の現勢(1937年版)》的粮栈数据制。

粮栈在农村的渐次消失对于农民意味着无法以相对有利于自己的价格出售所种植的农产品,农民从事种植的经济收益空间因此受到了进一步的压缩^①。假若说奉张时期东北农民种植“大田作物”的经济格局如王大任所分析的结论尚是利润空间的逐步压缩,而到了日据时期,这种种植除了极少数的大土地占有者,大部分农民已经直接转为亏本经营(见表9)。

表9 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农民收支表^②

农民阶层	收入(日元)	支出
大地主(>50晌)	1028	972.34
中地主(10~50晌)	547	507.94
小地主(3~10晌)	142	317.87
极小地主(<3晌)	176	194.53
富农(>50晌)	-	-
中农(10~50晌)	494	716.29
贫农(3~10晌)	186	213.27
极贫农(<3晌)	92	93.98
年雇工	140	129.35
月雇工	97	176.01
日雇工	107	108.76

资料来源:此表据伪康德7年的《满洲の农家经济概要》数据汇制。

与农业领域的建设忽视相比,日本将东北经济殖民的重点放置到了工业领域。日本在侵占东北之后,工矿业“掠夺”优先级就远高于其他经济领域。首先,对于工业及与其发展相关的领域投资上,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庞大,更体现在增长之速。以城市的基础建设经费投入为例,日本在1933年的投入为57353000元,而到了中日战争前的1936年则增至135674000元^③。同时,为了保证对于工矿相关行业

① 琼斯在《1931年以后的中国东北》就阐述了因战争与日本的殖民统治的关系,粮栈的商业资本外流而日趋衰微,影响了东北传统的市场组织,从而“增加了农村里普遍的不安和痛苦”,可参见[英]J.C.Jones:《1931年以后的中国东北》,胡继瑗译,第170页。

② 该表中的地主与自耕农大小划分是依据土地占有的多少以区分,其中地主为不耕作的食利阶层,耕作农为参与劳动的农民阶层。

③ [英]J.C.Jones:《1931年以后的中国东北》,胡继瑗译,第149页。

的有效管理,日本政府牵头组建了19家工矿类的公司,并由政府管理。最后,为了保证日本在东北的工矿业的扩充过程中的劳动力的充裕,日本对于关内移民与本土居民的农业经营限制准入的同时,却对劳工的准入“大开绿灯”^①。日本出于本国利益至上的殖民思维的考量,并不会真正地将关系工业化的核心技术与管理知识用以培养中国民众,所以20世纪前中期的工矿产业也并未包含过多的技术内容,并非当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产业,因此离不开数量巨大的非技术性的劳动者,加之土地经营的不顺与东北工业对于劳工需求的急速上升,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见表10)。

表10 1935、1940年东北城市人口数

时间	城市人口	总人口数	城镇化率
1925年	2629000	25318000	10.38%
1930年	3031000	30086800	10.07%
1935年	5604000	32391833	17.3%
1940年	9173079	43233954	21.2%

资料来源:该表的主要数据来自于李强:《伪满时期东北地区人口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而1935年的城市人口数据则源于权哲男:《伪满洲国农业经济分析》,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

三、伪满后期“总体战”时局下的作物种植景象

无论如何,东北农业种植的整体下滑,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除了数据中农业经济的明显衰退外,这一系列的恶果中对于东北民众影响最深,最为现实的问题在于,日本人主导的殖民地样板的所谓城市化、工业化^②的推进与农业经济的衰退景象呈现出反比场景,给整个东北的粮食供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问题在伪满建立之初尚不明显,农业种植虽然生产下降,却尚未触及粮食安全的红线。但日方持续地漠视,以及东北农村凋敝问题持续的恶化加上东北人口的增加,致使主粮作物的种植自1934年前后开始跌破粮食安全的红线,出现了低于总需求的粮食生产现象(见表11)。

表11 中日全面战争前后的东北人口数与粮食需求

时间	总人口数	粮食需求理论值	主粮三品产量
1933年	28979877	52888276石	55404948石
1935年	32391833	59115095石	54228657石
1938年	34421925	62820013石	60000000石

资料来源:人口数据来源于李强:《伪满时期东北地区人口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而粮食需求值则是源于《南满洲农业概要》所载“成人一日(三食)平均约需五合”乘以对应年份的人口数据所得;主粮产量源于昭和13年度的《满洲产业事情》,其中1938年的产量为假定增长的前提下按照1935年后粮食产量增长速率的数据推测所得的粮食产量。

① 据李秉刚、权芳敏的《日本在东北奴役劳工调查研究》的调查,仅1937年前为日本诱骗的东北本土劳工的数量没有明确统计,但估算值至少在150万人以上,而J.C.Jones利用满铁调查统计资料显示,从1935年至1938年,关内来到东北移民中的工业移民比例从84%增长至95%,即“在日本人的指导下,移民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中去了”。

② 需要解释的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进程对于东北地方的发展并无实际的益处,主要原因在于“近代化”核心因素的工业与技术知识并未由日人传授与华人,日本实际操控了这一进程中所有关键要素。琼斯本人也认为在日本对于东北经济体系的目标建构为“东北只不过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由日本做最后的加工”。

粮食供应危机的日趋凸显,促使日本逐步正视危机的可能发展方向与讨论如何缓解甚至结束危机的政治经济手段。而在此后,由于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与延长,战争的巨额消耗使得本就资源贫乏的日本更加缺乏足额的食粮与饲料供应战争的需要,日本官方亦默认对华战争的延长是加大对于东北农业关注的直接原因,“日满两国物资动员计划和生产力扩充计划的执行,日益强烈地要求满洲输出大豆和其他农产品。随着事变的长期化,趋于表面化的日本的饲料问题和食粮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靠满洲农业”^①,这就迫使日本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以保证对外战争得以延续基本物资供给。日本开始通过诸种方法将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销各环节纳入日本殖民官方的管理框架之内。其一,近代殖民国家通常使用强制性手段。自1939年,日本首先颁布《重要特产品专管法》,将例如大豆、大麻等油脂类作物的价格售卖以明文形式规定,紧接着由于计划中的粮食收购任务基本没有完成,“实现的结果,很难达到预定收购的数量”^②,于是将专卖与收购的粮谷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的粮食中,1940年日本主导下的伪满政府通过对《主要粮谷统制法》的修订,宣布包括高粱、粟与玉米等11种粮食品种纳入国家统制体系之中。自此,以城市配给制与强制购销的农业领域的统制经济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鉴于粮食供应的局面渐次严峻,粮食供应量的增加显得迫在眉睫,以国家命令为主要特征的粮食增产运动也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提上了日程,与粮食征购配给制度相同的地方在于“粮食增产运动”的要旨亦在于总体战的战争需求。关于这一点,1942年1月首次发布的《康德九年度农产品增产方策》的方针一栏,日本官方对此毫不避讳,“根据目前时局,油料资源需求量急剧增加的形势,除迅速增产植物油料资源(大豆、苏子、蓖麻、小麻子等)外,还需积极增产稻米和其他粮食,确保纤维原料的产量,使农产资源能顺利交售,国内民生得以稳定,从而对完成大东亚战争作出贡献”^③。从方策来看,日本对于东北粮食增产的政策方法似乎较为多元化。在技术改良的领域,伪满政府在重复改良耕作技术(奖励混合企业、实行地力恢复、普及机械农具等)、普及良种与驱除病虫害的老调外,改变以往的全国划一的增产指导,对于特定的农家与农村,要在技术和经费方面集中使用,重点指导。为恢复农民种植的积极性,扩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日本一方面制定了全新的种植计划指标,对于农产品尤其是关系日本战争命运的农作物明确指标以执行之,如在1942年的增产方策中,“计划农作物(20种)在上年度的基础上,计划扩大种植面积约60万陌;其中除去水田的扩大面积外,旱田需要扩大的面积约56万陌”^④;另一方面,鉴于农村现存劳动力不足以担负所期望的扩充种植的目标,日本操控下的伪满政府以“兴农增产报国”为幌子,号召东北境内的青少年、妇女以“勤劳奉公队”或“协和青年团”的形式下乡开垦荒地,尤其是,在1943年太平洋对美战事不断吃紧的背景下,明确将“无业游民、经营杂业及商业雇工、住在城市的地主”等四类城市人口以疏散的名义引导至相应的农村或者工矿部门从事基本的生产,以防止城市人口的集中对于贫乏的农业资源的消耗^⑤。

其二,日本还以经济诱导的软手段鼓励农民改良与扩大农业生产,包括作物的种植面积与产量。这其中颇为学界所熟知的政策即伪满的粮食出荷政策,中国大陆学界每论及于此,多从殖民主义的角度出发,讨论这一政策对于中国农民的掠夺迫害与对东北农业的打击从而将之归为日本殖民政治暴力的某

①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280页。

②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500页。

③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413页。

④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447页。

⑤ 人为的逼迫城市民众向乡村转移并从事劳作,可参见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455页。

种典型^①。需要指出的是,粮食出荷政策的履行虽然多因日本殖民者与伪满官吏的贪婪而带有很强的殖民政治暴力的色彩,但由于政策带有一定的奖励内容,故经济上的殖民性同样不可忽视。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为达到日本大东亚战争为直接目的,以粮食出荷为核心,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尝试重新建构起全新的、能够满足战争需求的农业战时经济机制。日本一方面秉承统制经济的核心要素,不断强化农产品出售的“本国至上”^②原则,以兴农合作社为主要的推行机构,将农产品交易放置于殖民国家的权力监控之中,如交易粮食种类、方式皆有严格的事项规程:“农产物交易场规程除另定外,应定左列事项:1.名称;2.位置;3.设营者;4.办理品目;5交易方法;6.买入人之资格”^③;而且同时以经济奖励的方式鼓励农民扩大种植及向殖民政权交售粮谷,“首先将增产作为第一目标。期望通过废除先钱制度;发放出荷奖励金;增加春耕资金;扩大耕地;三次彻底除草”^④。J.C.Jones 也认为从 1940 年开始,“农业预算支出作了大量增加,以便对农民发放奖金,并执行灌溉计划和其他农村复兴计划”^⑤。

表 12 1937—1943 年东北主要作物种植数据^⑥

年度	大豆			高粱			粟			玉米		
	面积	产量	单产	面积	产量	单产	面积	产量	单产	面积	产量	单产
1937	3612	4179	1.16	3225	4223	1.31	2931	3432	1.78	1399	2104	1.5
1940	3660	3519	0.96	3843	4498	1.17	3559	3604	1.01	2194	2871	1.31
1943	3045	3142	1.03	4083	5137	1.26	3474	3518	1.01	2802	3698	1.32

资料来源: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的《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东北财经委员会,1949 年。

在日本对于东北农业种植的政治“关注”下,东北地区主要作物种植总体出现了“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趋势与变化。一方面,作物的单产量在不断下滑;但另一方面,以粮谷三品为主的粮食作物与以大豆为主的大宗经济作物的种植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变动趋向(见表 12)。对此,我们不妨对照一下伪满后期的日本在农业领域所试图实现的数个目标。根据 1941 年后的兴农运动大纲可窥大概,其中约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关于作物。“1.对计划农作物之耕种地区,要规定最低限度的耕种面积。2.对于粮食作物的重点是数量而不是品种,各地区收获最多的农作物,要增加其耕种面积,力求总产量上能迅速增加。3.为使普通农作物和特用农作物在增产上能够合理并进,对特用农作物之栽培地区,应适当的、尽可能的集体化,便于贯彻指导、增加产量,提高出荷效率”^⑦。其二,则是关于农耕用地。日本主要采用了扩大农耕用地、保证种植面积的办法来增加各类农产品产量。“为了防止废耕。1.延长租地时间,改善租地条件,预防因租地纠纷而引起的废耕,县长或村长须根据法规原则加以调解;2.对废耕之荒地由县或村临时管理,并负责耕种”^⑧。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日本仍然谈及了“改良耕作技术、

① 除了部分专门论述粮食出荷制度的论文,如杨帆的《伪满时期日本对东边道耕地掠夺及粮食出荷》,《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孙彤、郑敏的《论太平洋战争时期伪满洲国“粮谷出荷”和“粮食配给”政策》,《大连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亦有部分从殖民机构或者统制政策的掠夺性的角度间接谈及“粮食出荷”危害度问题,如李慧娟等人的《伪满后期的农业掠夺政策及危害》,《安徽农业科学》2011 年第 13 期;滕义贵的《伪满经济统制概论》,《社会科学战线》1991 年第 1 期。

② 与近现代的民族国家有别的地方在于,这里所谓的“国家至上”是因伪满始终为日本殖民政治的傀儡与代言人,故而这其中的国家指代的是日本而非伪满。

③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 469 页。

④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 449 页。

⑤ [英]J.C.Jones:《1931 年以后的中国东北》,胡继瑗译,第 178 页。

⑥ 其面积单位为千公顷,产量为千公吨,单位产量为公吨。

⑦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 425—426 页。

⑧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 426 页。

普及机械农业与设立劝农模范场”^①这样的近代化农业的字眼,但总体而言,日本人对于东北农业的关注只在于各类农产物的增产,以保证对外战争日趋紧迫的物资需求,而在事关农业生产率的资本与技术,以及农业劳动力的投入中却明显不足^②,这也就解释了伪满后期主要作物普遍出现的单产下降的原因。

权哲男在考察伪满时期的东北农业时,指出市场环境的变化、农业技术与资本投入的停滞以及农业劳动力不足是导致伪满时期农业种植出现衰退的三大要素,可见这正是考察伪满时期东北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而针对主粮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截然不同的种植景象,在农业劳动力的总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技术与资本的投入以及市场的变化则成为了考察这一现象缘由的重点。事实上,考量技术与资本的投入要素可能存在差异。在伪满洲国后期,出于战争所导致的对于各类农业产品的需求增加,对于农业各类产品的政治关注已不再如伪满前期那般集中在与日本发展相关的原料作物上,而是更加趋于平衡,“关于粮食作物,各地区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增产计划,大量种植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作物。特别是要增产马铃薯和甘薯,有计划地使之粮食化。此外,鉴于大豆的播种面积和产量有逐年减少的趋势,为实现大豆增产,要积极保护地力和解决供求矛盾”^③,同时就实际效果来看,各类大宗作物的新技术的内容推广均未取得明显实效^④。可见,伪满后期的主粮作物与经济作物在农业技术与资本的投入与效果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性。

那么,最后考量市场方面的因素。日本出于维持战争的需要,对于农业物资的需求总体而言是有增无减的,但为了获取这些物资,日本方以农作物搜荷制度为依托,大量向农村征购各种农产品。由于长期是以远低于生产成本的方法收购东北农产品^⑤,这就导致了伪满的农产品征购计划的掠夺性相当明显,农民对于以殖民国家意愿进行农业经营的热情相当低下。同时由于农产品配给制的失败,自中日全面战争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后黑市就已普遍存在,并已成为了伪满后期的东北农民得以在日本掠夺性的农业政策下存活的重要因素,有学者估计伪满中后期的黑市农产品流通数量至少在140万吨以上^⑥。但以大豆为主的经济作物在黑市的流通中存在着不利因素,主要原因是日本在各种流通环节的限制方面十分严苛,“而大豆和小麦,由于近年来对地方的磨坊和油房进行了整顿,黑市交易很难进行”^⑦。因此以大豆为代表的大宗经济作物的衰退趋向在伪满后期尤为明显。但是,以粮谷三品为代表的主粮作物,由于携带方便宜于黑市交易,“高粱、包米和小米易于黑市交易和以物易物”^⑧,且作为民众主食,在黑市中的价值远超出了过去的经济作物大豆等。因此,整个中日战争期间的东北大田种植出现了有别于1937年前全面衰退的场景。粮食作物,尤其是作为东北民众主粮的作物,尽管单位产量与伪满前相比仍是较低的,但在其他数据上却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玉米,由于其耐寒性与单位产量相对稳

①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415页。

② 根据权哲男的《伪满洲国农业经济分析》所载的农业劳动人口与耕地数据计算,在1937—1945年,东北地区的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劳动力下降明显,从每公顷的2.14人下降至2.02人。与此同时,民间与殖民国家的农业新技术与资本投入应用也陷入了停滞,具体内容可参见权哲男:《伪满洲国农业经济分析》,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0—124页。

③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443页。

④ 根据权哲男:《伪满洲国农业经济分析》,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0—115页、第119—121页的考证,除了棉花、水稻等少量小宗作物的优良品种普及有显著效果外,其余技术改良措施几乎未取得明显效果。

⑤ 根据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东北经济掠夺》与权哲男的《伪满洲国农业经济分析》中的史料,自1939—1943年日本以低于成本的60%~70%的价格收购大豆、高粱等传统东北农作物。

⑥ 权哲男:《伪满洲国农业经济分析》,第211页。

⑦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515页。

⑧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第515页。

定的特点,到了对日战争胜利的前夕,种植面积与产量几乎是成倍数的上涨^①(见表12)。

结 论

近代以来,伴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大豆的经济价值迅速地提升,东北地区形成了以大豆为中心的农业种植景象。尽管如此,由于人口压力的因素,东北地区的南北出现了种植景象的差异;九·一八事变前后,世界性经济萧条的出现,重创了欧美国家的油脂工业,大豆市场萎缩,因此农民逐步放弃了以大豆为中心的种植经营策略,奉张时期以大豆为中心的大田种植格局开始动摇;与此同时,由于日本“本国至上”的殖民主义方针,将伪满国家的经济重心集于与日本发展相关的产业当中去,从而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与农村经济的疲乏。为此,东北的农业种植迅速滑向衰落的深渊;到了伪满后期,由于战争的关系,物资供应的不断紧张,在不改变“本国至上”的殖民原则基础上,日本加大了对东北农业的控制与掠夺,从而导致了东北农业种植总的增长与单产的下降,也导致了农产品黑市的盛行,加上主粮作物与经济原料作物在交易的方便性方面出现较大差异,于是,以大豆为主的经济作物不断衰退,以粮谷三品为主的生活作物却出现了畸形的种植热情。

本文以1905—1945年东北大田作物种植格局变迁为主题,希望引起讨论的是农业种植作为综合性的农村经济事业,其结构是怎样变动的,又是受到怎样的要素影响所致。对于作物种植格局这样的农业景象而言,不同历史时期蕴含的社会与经济要素所引起的作物间种植效益的变化正是构成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作物种植景象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而在1905至1945年间的我国东北地区这一历史特殊时刻,作物种植效益频繁变动的过程中,伪满的殖民政治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限于篇幅与资料,笔者无法就更长时期的东北地区大田作物种植变迁进行讨论,也就无法阐述诸如技术、自然等要素与作物种植的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模式,这可能是本文的缺憾所在,留待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修正完完善。

(责任编辑:李良木,胡文亮)

[参 考 文 献]

- [1]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2] 权哲男.伪满洲国农业经济分析[M].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
- [3] 刘 帅.市场交易条件与农户种植行为决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 [4] 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J].历史地理研究,1990,(2).
- [5] 于春英,张立彬.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与布局的变迁[J].历史教学,2010,(4).

① 早在民国《昌图县志》中就有玉米“不畏霜雹遍地尤宜”的耐寒特性论述,而王晓煜等人的《气候变化背景下东北三省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潜力及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中也发现玉米的光温产量潜力最高。在伪满后期,由于扩张耕地与限制农业移民的政策,东北地区尤其是北满地区耕地中的单位劳动力与资本的降低,大部分农产品单位产量出现损失,玉米单位产量为粮谷三品损失后最高,为1.32吨/公顷,而高粱为1.26吨/公顷,粟仅为1.01吨/公顷。